编辑:施亚泽 美编:刘玉容 校对:陈俊 组版:翟晓东

# 陈独秀为何大骂韩国钧

□夏俊山

陈独秀为什么要大骂韩国钧？他俩有过交集吗？是否结下了私怨？笔者读了不少与陈独秀或韩国钧相关的文献资料，发现他俩虽然都在安徽安庆市任过职，但彼此并没有直接接触，最多只是有过“间接”的交道。

图左起：陈独秀、韩国钧。

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的《陈独秀文集》（套装共4卷）是国内资料最为齐全的研究陈独秀的文献汇编。在《陈独秀文集》（下）有一章《国民会议声中之民选省长》，这一章虽然不长，大约千字，却有三处提及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韩国钧。善于骂人的陈独秀在文章开头就“开骂”：

“民选官吏，在理论上是民主政治所必需的；在事实上亦为中国时势之急要。他省且勿论，眼前最急需民选省长的：若江苏、若浙江、若安徽、若江西、若湖北、若直隶皆是。江苏省长现为卖省附齐的韩国钧，彼纵无耻恋位，亦必为苏人所不容。”

“齐”是指当时的直系军阀齐燮元。这段话直接就给韩国钧扣上了一顶“卖省附齐”的大帽子，并且认定韩国钧当省长“必为苏人所不容”。

韩国钧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泰州泰县海安镇。清光绪五年（1879）韩国钧中举时，陈独秀于安徽怀宁（今安庆）出生，光绪二十二年(1896)考取秀才。两人相差22岁。

1912年7月，袁世凯任命柏文蔚为安徽都督。“柏文蔚到任后，陈独秀被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，陈又筹办省立大学，任命马其昶为校长，陈独秀自任（兼）教务长。”（参见民国《安庆旧影》73页。作者程晓苏。1983年安庆交通局史志办公室印。）

遗憾的是，陈独秀筹办的这所省立大学命运多舛。“1913年8月28日，反动军阀倪嗣冲终于拒杀了没有实力的淮上革命军的抵抗，进入省会安庆。革命党的变节者合肥人胡万泰迎降了倪嗣冲，倪便大肆屠杀安徽的革命党人。陈独秀随着柏文蔚也在被逮捕名单之中，都仓皇逃走。正由于这个原因，省立大学筹备未及一年，还没有取得任何成果，便被并入在当时勉强合法存在的私立江淮大学。”（见《安徽大学校史溯源》。张珊著，安徽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6月版第11页。）

陈独秀筹办的这所省立大学，据《安庆地区志》（黄山书社，1995年12月版第930页）记载，系利用原安徽师范学堂校址办学，校名“私立安徽高等学堂”。不幸的是，私立江淮大学很快将陈独秀创办的学校吞并。加上倪嗣冲又“派人搜查安庆水关的陈独秀家。陈独秀已经事先躲避，遂将其16岁的侄子和仆人带走，房屋查封”（见《倪嗣冲年谱》。李良玉著，黄山书社2010年7月版第46页）。这些事发生后，陈独秀无疑会痛恨倪嗣冲。次年（1914年），“五月二十四日，政府电令调任安徽巡按使”（见韩国钧《止叟年谱》19页）。尽管韩国钧和倪嗣冲合作并不愉快，但是韩国钧并没有考虑私立江淮大学吞并陈独秀创办的学校，而是，“在安徽巡使韩国钧的调停下，1915年江淮大学改为省立法政专门学校……法政专门学校则受到军阀政府的控制”（见《安徽教育》。吴海升主编。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1月版116页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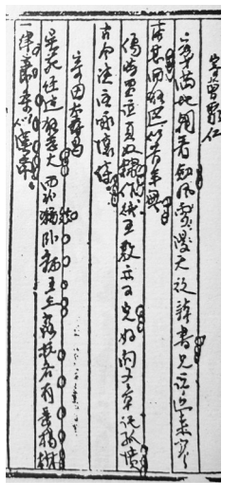
对“私立安徽高等学堂”的处理方式，其实怨不得巡按使韩国钧。韩国钧主政安徽时，陈独秀创办的学校已经不存在，韩国钧将私立江淮大学改为官办的省立法政专门学校，很可能只是顺应形势。换个角度，陈独秀大骂韩国钧，未必是韩国钧错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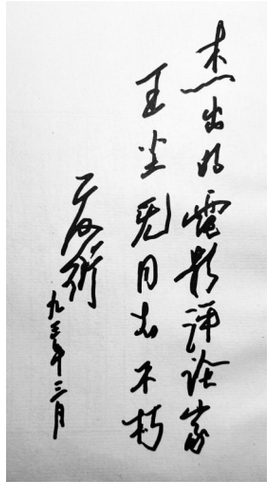
读《陈独秀文集》，可以发现陈独秀骂过不少人，有的骂对了，有的骂得并不对。例如，《厦门大学学生也有今日》一章，陈独秀开篇就骂厦门大学的创办人：“陈嘉庚出资兴学，一时颇博得社会称赞，其实他完全是个市侩，不知教育为何物，不但把学生当奴隶，连职教员也都是他的雇用人。”1924年，泰戈尔访华，陈独秀斥责他：“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！太戈尔！谢谢你罢，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呵！”（见《评太戈尔在杭州、上海的演说》，载《陈独秀文集》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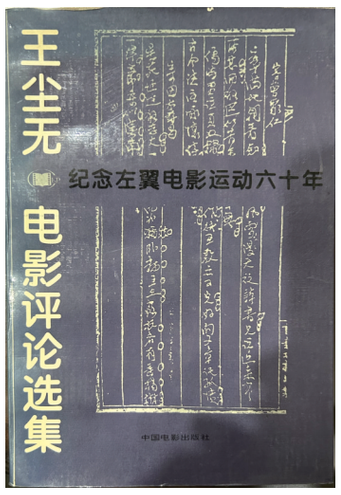
韩国钧第二次主政江苏是1922年。“黎元洪复总统位，五月二十一日，奉政府电，调任江苏省省长，仍电辞。”“齐督军再派高淞荃刘君实来，言已电中央，催请赴苏，国务院亦不允辞，不得已，乃赴宁就任。”（《止叟年谱》24页）韩国钧任江苏省省长，显然是黎元洪的决定，韩国钧多次推辞，到南京赴任是“不得已”，在《国民会议声中之民选省长》中，陈独秀骂韩国钧“卖省附齐”，无疑是冤枉了韩国钧。

那么，陈独秀大骂韩国钧，是不是泄私愤呢？《国民会议声中之民选省长》中，还有两段：“中国政局倘不能即时进入较清明的政局或最反动混乱局面，上列各省省长都必然不能久居其位，他们虽然能指使一班走狗拥戴，若东南大学教授之拥韩，若湖北招牌公团之拥萧，决与大多数民意无涉。”“‘某省人治某省’，也和省民的权利无关，那省人没有军阀官僚，请看苏人治苏的韩国钧、鄂人治鄂的萧耀南、湘人治湘的赵恒惕就是榜样。我们要将民主政治实现于地方政府，我们要得着民选官吏权，只有号召省民会议实现民选省长是正确的发足点。”

原来，他大骂韩国钧是假，骂北洋政府的用人制度是真。陈独秀骂人痛快淋漓，也可能会骂错人，不过，更值得我们关注、思考的是：陈独秀大骂韩国钧，其目的是希望社会进步，还是泄私愤、乱咬人？他的胸怀是磊落的，还是狭隘的？如果是夹带个人恩怨大骂韩国钧，就是仰天而唾、逆风扬尘，损不到他人，反而污了自己。







# 左翼影评先锋王尘无

□梁天明

王尘无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杰出的电影评论家。他只活了28岁，没有留下妻室、后代与遗言、坟墓，留下了48篇电影评论、12篇电影论文、59篇电影杂文以及散文集《浮世杂拾》这样的文字，为左翼进步电影开辟道路，在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纪念碑上留下光辉的名字。

上图左起：王尘无，王尘无遗墨，夏衍题词，王尘无电影评论选集，1933年6月18日刊于《晨报》副刊《每日电影》上的《我们的陈诉，今后的批判》。

**左翼影评的开拓者**

王尘无，原名王承谟，1911年1月23日生于江苏海门汤家镇。父亲王燕宾在汤家镇上开设“裕大南货店”经商为生。王燕宾有六子三女，王尘无是第三子。王尘无少时在家乡读书，受当时海门地下党县委书记洛克同志的诱导，要求进步，倾向革命。1927年，去无锡国学专修馆攻读。1929年，进上海持志大学继续学习。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翌年回到海门乡下，任海（海门）启（启东）中心县委秘书。1932年，在领导海门进步学生运动中暴露身份，为避开反动派的追捕，只身来到上海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成为左翼剧联的影评小组的负责人之一。党的电影小组成立后，他是小组的成员，以“尘无”“向拉”“方景亮”“离工”“摩尔”“劳人”等笔名，活跃在影评阵地上。1938年5月25日，因严重肺结核久卧病榻的王尘无与世长辞。

当时的中国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，呈现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状态。1931年的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，广大观众对电影脱离现实不满，强烈要求看到能反映现实的新电影。在中国共产党人进入电影领域之前，银幕上充斥着反映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片，色情片、辱华片、古装片、神怪片几乎垄断中国电影市场，千篇一律的套路也使观众逐渐失去了新鲜感。电影公司面临严重危机，意识到吸收进步作家参与剧本创作的必要性，新文化工作者也认识到电影在宣传教育群众方面的巨大作用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，左翼电影获得了兴起的契机，中国电影被纳入了新文化的轨道。

王尘无的影评活动就是从这时开始的。那时，中国电影事业处于历史的转折时期。田汉、洪深、郑伯奇、郑正秋等正直的文艺工作者跻身影坛，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进行了可贵的努力。1932年5月，以夏衍为组长，由钱杏村、王尘无、司徒慧敏、石凌鹤等人参加的党的电影小组成立。从1933年开始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下的影评人小组逐步占领了影评阵地。很多重要报纸如《申报》《大公报》《晨报》《大晚报》等都辟有刊登电影评论的电影副刊。同时还出版了以电影评论为主的电影刊物。一批著名的左翼影评家如夏衍、郑伯奇、石凌鹤、鲁思等，积极发表文章探索中国电影前进之路，向帝国主义和封建电影文化发起进攻，王尘无和战友们在一起，冲刺在最前线，为左翼进步电影开辟新路，他对上映的国内外影片依据政治内容进行评价，并热情推荐苏联影片和介绍苏联电影理论，借以提高中国电影工作者与观众的创作与欣赏水平。

1932年5月30日，王尘无首次以尘无的笔名，在《时报·电影时报》上发表了《从浅薄说到滑稽》，文中王尘无愤怒地对那些充斥银幕的“趣味低级，庸俗浅薄”的影片进行了鞭挞，是左翼电影评论家们向落后污浊的旧影坛打出的第一枪。

从1932年5月起到1933年，是左翼影评的开拓时期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。这一时期的活动，王尘无作出了重要贡献，发表了大量的影评。1933年5月，他的论文《中国电影之路》，详尽地论述了电影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方针和任务，对左翼电影运动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，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。他在文章最后发出呼号：“同志们努力吧！为了中国电影的前途！为了中国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前途！”

**威信最高的影评家**

1933年，在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，左翼影评活动迅速地、有声势地开展起来。自《狂流》问世之后，王尘无等左翼影评人大力推介，为左翼影片走上银幕扫清了道路。1933年被称为“中国电影年”，以《狂流》发轫，《铁板红泪录》《春蚕》等一批左翼影片相继出现，丰富了中国电影的表现题材。1933年6月18日，王尘无联合夏衍、郑伯奇、阿英、洪深、沈西苓、柯灵、陈鲤庭等十五位进步的电影工作者，联名发表了《我们的陈诉，今后的批判》，明确提出今后电影批评工作的方针任务，表示对影片的思想内容，要“如其有毒害的，揭发它；如其有良好教育的，宣扬它；社会的背景，摄制的目的，解剖它”。影评人对电影工作者的帮助与批评，推动其中的进步分子走上了左翼电影的道路。

这一时期，王尘无既是左翼电影评论活动的领导者、组织者之一，又是一个很有影响的“影评人”。于伶在《回忆“剧联”话影评》一文中称王尘无是当时的“权威影评家”，“在许多影评人中以尘无在广大观众和读者中间的声誉与威信为最高，每当影片上映时，有些青年观众会说：等读到尘无的影评文章，看他说好说坏，再决定去看哪一部影片好。”在此期间，王尘无写了大量的影评文章。其中，有对国产影片的评介文章，也有对外国影片的评介文章，既有就一部影片发表看法的文章，也有对某一类影片、某一类问题进行综合评论的文章，为以后电影运动的深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**电影理论的探索者**

王尘无是最早进行左翼电影理论研究的影评家之一，他对中国左翼进步电影理论的发展，充当了开路先锋的探索者。他本来是从事文学创作的，但当他开始电影评论后，他认为对人民大众而言，“‘电影比文学的作用更大’，这一点坚定地横在我的意识上，所以，当我做着更直接实现我这一种信仰的事的时候，我是毫不可惜放弃我的创作。”1932年6月，他的长篇论文《电影讲话》分六期连载于《时报·电影时报》上，可以说，这是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、文艺观，对中国电影的现状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比较系统剖析的一篇文章，是一份普及性的左翼电影理论的宣传教材。

1933年5月，王尘无写了《中国电影之路》一文。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各世界观对中国的经济状况、政治状况、各阶级面貌、电影事业现状进行了科学分析，明确指出当前中国电影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，并提出：“只有建立起中国电影观和电影批评的标准，我们才能更具体的、更有计划的推动促进中国电影”。

《中国电影之路》是王尘无的一篇重要理论著作，与郑伯奇的《电影罪言》、阿英的《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》等论文一样，都对后来左翼电影运动拍摄大量进步的优秀电影产生了积极影响，是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的重要文献。

1936年1月，文学界提出了“国防文学”的口号，电影界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国防电影的讨论会，在关于国防电影问题的讨论中，王尘无抱病写作了《一个电影批评人的独白》一文，着重就国防电影的题材问题和电影批评问题发表了意见，对正确贯彻党在电影界的统一战线，对促进和指导“国防电影”的创作，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。

王尘无有很深的文学素养，读他清新敏感的散文、读他精辟泼辣的批评，再读他的旧诗文，简直可以使人不相信这是出自一人之手。他写有许多散文，编成《浮世杂拾》一书，这些散文文笔清新秀美，充满了田园式的诗情画意，细腻地表达了王尘无热爱家乡、热爱祖国，对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，表达了他在黑暗中的沉重呻吟，以及与疾病搏斗时的一腔哀愁。

# 纱帽石、梯青楼与朱觉我抗倭事

□石光泽

如皋临江面海，明朝时期常常是倭寇侵犯的目标，邱陞、刘景韶等抗倭名将的事迹至今在当地流传。其时，大的抗倭战事一般集中在沿海地带，而位于如皋南乡的范湖洲古村落，也曾发生过可歌可泣的抗倭斗争，至今还保存着与这段历史有关的文物。

民国《范湖洲小志》中，记载了与抗倭有关的梯青楼与纱帽石：

梯青楼，在范湖洲东，十六世明上舍觉我公建，以防倭也，今圮。旧谱记楼在公内宅堂东，五楹三级，高五丈有奇，四围墙垣峭立，不设窗牖，环以女墙巉嶫，下祗一门启闭，裹用铁叶。时际明末倭贼屡犯县境，洲逼近江海，贼不时乘潮而至村中，掳掠一空，公筑斯楼，非为一家计也。闻贼至，令族人将金帛什物及妇女悉入此楼，铁门闭险，贼至则灰瓶矢石自女墙纷如雨下，贼不敢近，入他室则空诸所有，一无所获而去。以故各村皆罹贼害，洲独无之。阖族赖为保障，称道其德勿衰。闻父老相传四十年前楼犹屹立重霄，行道人在二十里外，即于树梢见峥嵘一角云。纱帽石，一在洲东，一在洲西。皆缚贼石也。明季海贼剽掠，数至洲，为害族人。善技击者协助安民营兵，获贼，悉缚此石毙之。今岿然如故。说者谓雨晦风潇，犹见青磷闪灼云。

梯青楼、纱帽石一直是当地耆老口耳相传的故事，可惜的是，范湖洲的抗倭历史未能进入官方视野，像邱陞、刘景韶等先贤一样树碑立传。直至民国时期，沙元炳先生主修《如皋县志》方采入《古迹》：“梯青楼，在范湖洲中，明万历十九年朱觉我建”“纱帽石，二方峙于范湖洲之东西，明季为缚贼立”。

关于朱觉我，《如皋范湖洲朱氏族谱》收录有邑人吴文聪所撰《朱觉我先生防倭纪略》一文，这篇文献知道的人很少，兹全录如下：

古倭国在中国之东，地方千里，附庸国百余，地广种多，性复凶恶，束婴孩于竿上，沃以沸汤，视其啼号以为笑，乐嗜酒，荒淫有不可胜言者。自明初内寇金乡，上召汤和沿海筑城防之，而倭风沓至，焚劫官廋民舍。复诏增城堡、谨斥堠，分兵守要害。嘉靖间，叠犯皋境，所过杀伤乡民无算。兵备副使刘景韶率游击邱陞，生擒力战，邱陞死之。至万历十九年起，朝鲜从滨海扬帆而来，遍肆虔刘，刈割之惨，生类等之，剑炊矛浙。范湖近江曲，港深芦潜为窟薮，乘潮至村，掠剽一空。公生万历己亥，屡濒于危，每虑之曰：“若无所恃以为固，吾辈皆血肉之聚也。”于是特建梯青楼以备一洲保障，为捍卫计，非为登临地也。为阖族庇，非为一家利也。高五丈余，在内堂之东，五楹三级，环以女墙，不设窗牖，以铁叶裹门，闻寇警，凡族间妇女悉入是楼以避，并运贻金帛什物，此外若空村然。义勇乡民环立女墙以待，至则灰瓶矢石，纷如雨下。贼人不敢逼近，一无所获而去。以故各村皆罹贼害，洲独三十余年恃以无恐，皆公之力也。范湖固多名楼，若宝砚、贮月、玉树，要皆烟云墨沈风雨书镫之所，未闻以楼为御灾捍患者。兹则耸踞于纱帽石畔，矗立于芸晖阁边，俨城垣之峭削，类碉卡之崚嶒。碧眼人来似鬼仰，而视之若登天；红毛刀耀如霜无所用之，而面壁此楼。直可与汤信国公之沿海筑五十九城及增城堡、谨斥堠同，其防备有广狭而无异同也。人谓于此见公之智仁勇，而吾谓实见公之孝，以此楼为全洲之计，端五公之云、礽、昆、耳胥获安堵矣。楼居范湖之中，东西相望，有屹然巍然之势。向为五老房公所，今属三房之子若孙，以无力修整，久之倾圮。过其地者犹想见我公之防倭有道，可以匡当事之不逮，以垂裕无穷，不禁为之睾然高望也夫。

梯青楼今虽已不存，我们尚能从文献中的描述想象其大概“高五丈余，在内堂之东，五楹三级，环以女墙，不设窗牖，以铁叶裹门”，用今天的计量单位换算，高约16米，三层高，第一层五间房，可以尽可能容纳全村的妇女；不设窗户，用铁片包裹大门，防止倭寇用火攻烟熏；楼顶有一圈矮墙，义勇乡民守立其中，居高临下，易守难攻。倭寇属于流寇，只要抵挡住他们一时的进攻就能保障全村人的安全，百年之后的我们，也不得不慨叹朱觉我的“智仁勇”，以及拳拳爱乡之情。

梯青楼虽已不存，纱帽石则有幸保存下来。纱帽石实际上是上马石，供古代骑马者上下马使用，其前后高低形似纱帽，故名纱帽石。历经岁月的侵蚀，表面风化严重，但其中一块尚保存有纹饰，四周有海棠绦环纹，中间的花纹似祥云（见下图）。这两块纱帽石也曾险些离开范湖洲，幸得有识之士保护，使我们尚能一睹这两件历史遗存。

汤和沿海铸城堡、邱陞杀倭成仁，这些是为人熟知的官方抗倭行为，而朱觉我建梯青楼防倭则是完全的民间行为，范湖洲的这段历史可以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，小地方在大历史上也会留下厚重一笔。

# 名家共品骑岸大方柿

□程太和

据史料记载，张謇也特别喜爱本地产柿子，尤其是通州骑岸镇的大方柿。骑岸大方柿，当地叫“金盆月”，起源于清康熙年间，由镇郊货郎张小六从外地带回种植，已有350多年历史。通州人、清同治年间举人陈昌鼐有诗赞曰：“骑岸金盆月，江淮众口夸。方平戴翡翠，通体染朱砂。滋燥润肠胃，甘淳溅齿牙。中秋有此物，何必觅其他。”

民国十一年（1922年）八月，中国科学社在南通召开第七次年会，张謇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博物苑东水榭举行“金盆月”大方柿品鉴会，到会的有科学界、教育界知名人士梁启超、竺可桢、杨杏佛、陶行知、黄炎培、马相伯、茅以升、丁文江等人。众人齐夸“金盆月”大方柿风味独特，实在难得。当时的《通海新报》对此事曾作报道。

民国时期，南通地区散生柿树分布面广量大，尤以南通县骑岸镇、五总乡、新华乡，如东饮泉乡、童甸乡、新店乡、汤园乡，海安李堡镇，海门县德胜乡，启东县新义乡，如皋县城西乡等地分布较广，数量较多。20世纪50年代，南通芦泾港苗圃建成成片柿园。50年代末，启东县从芦泾港苗圃引进大方柿建成片园，其他县也有的相继建成柿园。60年代中期，如东、启东、海安等地从山东引进加工柿接穗，繁殖苗木，在农村沟旁、渠旁，居住屋地四周隙地发展四旁柿树。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，南通各县先后从山东、河南等地调进大批“君迁子”品种繁殖苗木。1982年，南通地区有成片柿园506亩，占全省的19.5%；成片柿树产量146.3吨，占全省的23.6%。全地区散生柿树38万株，占全省的57%；散生柿树产量4322.6吨，占全省的47.1%。南通成为全省有名的柿子大市，各类柿子远销上海、皖南、浙北等地，可谓“百万红柿下江南，香气扑鼻醉人愁”。现在，南通地区的柿子品种主要有大方柿（即“金盆月”，在如东叫“金黄瓜”）、小方柿（又叫“四丫红”“小方红”），还有朱砂红、蟹壳青、霜来黄、翁柿等。